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类型、格局与机理研究 ——以苏州东山镇为例

徐冬¹, 黄震方², 洪学婷², 李东晔², 沈伟丽²

(1.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南京 210046; 2.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 南京 210023)

摘要: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文化日益受到冲击, 并表现出衰落的现象已是客观不争的事实。紧跟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和文旅融合发展趋势, 综合运用质性研究和空间计量方法, 以苏州东山镇为例, 探索了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类型、格局与机理, 结果表明: ①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量表包含23个题项、5个维度, 即“自然景观文化胁迫”“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生产生活文化胁迫”“人际交往文化胁迫”“精神仪式文化胁迫”; ②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多呈沿街、邻水分布, 各维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分布差异较大。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总体上呈显著集聚, 其中生产生活文化最易受到旅游开发胁迫而表现出空间受胁症状; ③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具有多集核分级分布的核心-外围分布模式, 且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提高其空间集聚程度显著提升, 各维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特征差异较大, 其中聚落景观文化胁迫具有“大聚集、小分散”的空间特征, 且与总体最为类似; ④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个体和整体两个层面, 个体层面的社会属性和观念认知差异, 以及整体层面的基础条件、社会发展和政策宣传共同作用着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产生和发展。

关键词: 乡村旅游地; 乡村文化; 空间格局; 胁迫机理; 东山镇

DOI: 10.11821/dlyj020191039

1 引言

乡村旅游兴起于19世纪中期的西方世界, 其目的是为了拯救乡村经济危机, 而国内乡村旅游则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 经过40年的发展, 乡村旅游供需市场呈井喷式增长^[1]。随着体验经济时代深埋人们心中的乡愁的觉醒, 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开始涌入乡村地区, 为了满足其消费和休闲需求, 很多传统村落被开发为旅游地。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 在带来乡村经济振兴并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 也带来了乡村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的诸多困境^[2,3]。加之乡村旅游地的开放性, 很多文化底蕴深厚的传统村落逐渐沦为城市人的“娱乐场”和开发者的“逐利场”^[2,4]。因此, 有学者呼吁乡村旅游发展的理论反思和困境突破, 保留和存续乡村文化的原真性和真实性, 寻求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和模式^[4-7]。

胁迫的概念起源于生态学, 通常指代不利的或消极的影响, 胁迫生态学中用这一概

收稿日期: 2019-11-29; 修订日期: 2020-04-2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71137, 41871141, 41771147);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19_0764)

作者简介: 徐冬(1992-), 男, 河南开封人,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

E-mail: xudong_njnu@163.com

通讯作者: 黄震方(1963-), 男, 江苏扬中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

E-mail: zhfh@263.net

念来表达当前有机体显著偏离其最适宜生长条件（基本生态位）的所有环境条件，其也是胁迫生态学研究的核心^[8,9]。德国洪堡大学的Steinberg认为胁迫通常被认为是不好的，如工作压力大、任务失败和家庭矛盾等^[9,10]。胁迫不止存在于生态学领域，在旅游人地关系中也存在着胁迫效应的产生与发展^[8-10]。鉴于胁迫生态理论已在环境学^[11]、管理学^[12]和城市研究^[13,14]等领域表现出解释系统受胁的有效性，且乡村文化系统（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同样受到旅游开发、城镇化、现代化等外部因子的作用，会通过症候群表现出受胁症状，因此胁迫生态理论可以作为研究乡村文化影响的新视角^[10]。本研究从胁迫生态理论出发，认为乡村文化胁迫是乡村文化系统受外部因子影响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偏移或改变，是引起乡村文化系统发生变化、产生反应或功能失调的作用过程。与以往旅游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研究同时关注旅游带来的积极和消极效应不同^[2,15-19]，基于胁迫生态理论的研究是对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文化问题的深刻反思，侧重于更加全面地发现旅游开发带来的负面效应及其空间特征（且并不否定旅游带来的益处）。这一研究在理论上可为深刻揭示旅游发展对乡村文化的影响类型、过程与机制并采取有效的文化利用模式提供依据，在实践上可为乡村旅游地文化传承与保护，实现乡村旅游社区的有效治理和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虽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关注了乡村旅游地的文化影响，也用不同方法研究了旅游影响的主客感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但仍有不足。第一，胁迫生态理论以关注和阐释负面效应见长，对判断系统受影响程度，防止系统退化、崩溃，指导系统管理、恢复与重建等具有重要意义^[9,10]，并已在多个学科领域展现出适用性和科学性^[10-14]，但胁迫视角下相对完整有序的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研究体系尚未形成；第二，以往旅游影响研究多将文化视为类属于社会维度的几个方面^[17,20-23]，忽视了文化的系统性，广义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赋存于乡村地域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5]，是乡村地域包含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独立生态系统，但当前尚缺乏对广义视角下乡村文化影响的系统性研究，亦缺乏不同时空尺度下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空间格局与机理的阐释；第三，学者们已认识到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3,5-7]，但对乡村文化受胁状况的已有研究主要以定性描述为主，缺乏可供参考的统一性量化指标，当前迫切需要构建乡村文化胁迫量表，结合空间计量技术更加直观地表达乡村旅游地文化受胁的空间症状^[3,10]。基此，本文采用“空间换时间”思维，选取苏州东山镇处于不同乡村旅游发展阶段的陆巷、翁巷和杨湾古村为研究对象，借助质性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在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类型和维度划分的基础上，探索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空间格局与形成机理，以期为理解和揭示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状况和变迁规律提供科学依据，为指导乡村旅游地文化保护和传承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2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来源

2.1 案例地概况

苏州东山镇，是伸展于太湖东首的一个长条形半岛，也是太湖中最大的陆连岛，总面积96.60 km²（图1）。东山镇素以湖山秀美、花果成林著称，境内低山、丘陵绵延起伏，主峰莫厘峰为东山镇第一高峰，海拔293.5 m。东山镇旅游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21世纪以后迎来快速发展，2018年东山镇接待游客322.1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7.45亿元。在旅游引导下，东山众多古村落被开发为乡村旅游地，面临着开发与保护双重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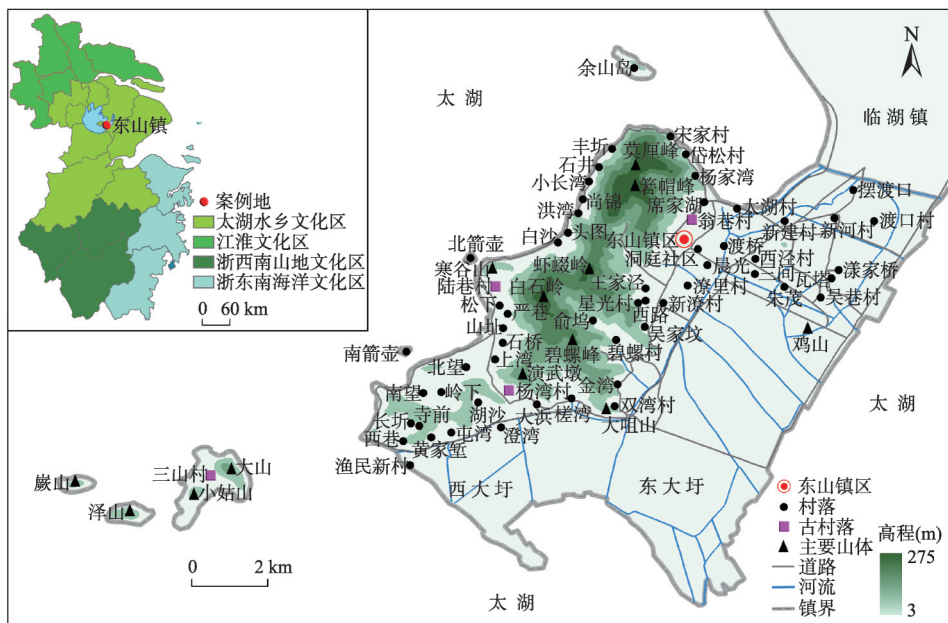


图1 案例地文化区位示意与村落分布图

Fig. 1 The cultural location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llages of the study area

本研究选取苏州东山镇为案例地，并以陆巷、翁巷和杨湾作为具体研究对象，主要考虑以下4点：①东山镇乡村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东山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境内陆巷、杨湾和三山村分别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陆巷、杨湾、三山和翁巷村又被命名为中国传统村落，乡村文化在全国具有典型性；②兼顾了乡村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双重属性。东山镇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太湖风景名胜区十三景区之一，其范围内的文化资源是保护的重点。同时，其又是苏州吴中太湖旅游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一部分，兼具了旅游开发的重任；③乡村文化遭受旅游开发的影响具有代表性。在城市消费需求外溢的大背景下，处于大城市（苏州）边缘的东山镇，自1974年拉开旅游发展序幕以来，旅游开发在带动其经济振兴的同时，也使其乡村文化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甚至胁迫，出现了乡村文化过度商业化、旅游化和城市化等现实困境；④陆巷、翁巷和杨湾分别处于乡村旅游的发展阶段、参与阶段和探索阶段（3个村落旅游业分别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2003年和2010年），具有对比研究的典型性和剥离城镇化、现代化对乡村文化影响的可行性。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是通过史料挖掘、参与式观察、影视人类学摄影、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等途径获取，目的是为了发现案例地乡村文化胁迫类型与载体、维度与命名、格局与机理。首先，史料挖掘主要是为发现案例地乡村文化胁迫类型与载体提供基础资料，史料涉及地方志、相关文学文本和文献。其中地方志主要包括《东山镇志》^[24]等；相关文学文本主要有《东山历史文化丛书·东山艺文志》^[25]等；此外，还参考了已发表的与案例地相关的文献和政府历年发布的政策文件等资料。

其次，参与式观察、影视人类学摄影与深入访谈伴随着对案例地的田野调查同时进行，但也有所侧重，主要是为了确定案例地乡村文化胁迫类型与载体，并为问卷设计提供理论基础。2016年7月到2019年10月的3年多时间里，研究团队共分5次对东山镇进

行了为期20多天的实地调研,获得一手现场照片966张(共计3.70 G)。5次调研具体包括:①预调研阶段是初步了解案例地旅游发展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基本情况;②一次调研阶段是在形成问题的基础上,到田野进行的实地调研、走访,并获取大量现场照片和资料;③二次调研阶段是对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现状进行访谈,共访谈了7名村民;④三次调研阶段是根据前期调研的结果与不足,进行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与机理的更加深入的访谈和问卷预调研,共访谈28名当地村民、旅游从业者和村委会成员,发放问卷83份,回收有效问卷74份;⑤四次调研阶段是根据需要所进行的查漏补缺、补充调研和访谈,共访谈了4名村民,随后形成正式问卷进行发放,共现场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94份(二、三次调研共得到有效问卷468份,问卷有效率为96.89%,其中陆巷249份,翁巷106份,杨湾113份)。通过观察样本数据内容,发现受访者所陈述的内容在第35位开始饱和,信息新增量基本为零,四次调研阶段所访谈的4位人员所回答问题和表达信息也证明了数据实现饱和这一结论,故本研究的39名总样本可以实现数据饱和性。

再次,实地访谈是在一个粗线条的提纲下进行的半结构式访谈,重点对当地居民、乡村旅游从业者进行询问、倾听和记录,不将研究预设强加给访谈对象。整个访谈过程采用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形式进行,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后才进行现场录音。访谈问题主要集中在他们对于家乡旅游开发对本地乡村文化产生影响的现实看法以及他们的感知情况。在案例地的深度访谈共获得录音1157分钟(共计1.18 G),整理后得到录音文本125024字(共计323 KB)。39位正式访谈人员中,有男性19人,女性20人,年龄处于21~75岁,1960—1978年出生的居民占比最高,为41.03%(表1)。信息统计结果表明所抽样调查的39名访谈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1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研究的受访者信息统计

Tab. 1 Respondents' statistics on cultural stress research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项目	类型	人数(人)	百分比(%)	项目	类型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19	48.72	家庭所在地	陆巷	21	53.85
	女	20	51.28		杨湾	9	23.08
出生年份	1930—1949	4	10.26		翁巷	9	23.08
	1950—1959	8	20.51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9	48.72
	1960—1978	16	41.03		高中(含中专)	9	23.08
	1979—1989	6	15.38		大专及本科	10	25.64
	1990—2000	5	12.82	硕士及以上	1	2.56	
职业	学生	2	5.13	本地居住年限(年)	≤10	2	5.13
	公司职员	8	20.51		10~20	2	5.13
	农民	8	20.51		20~30	7	17.95
	私营业主	14	35.90		>30	28	71.79
	公务员	2	5.13	是否参与旅游	是	15	38.46
	退休工人	5	12.82		否	21	53.85
家庭年收入(元)	≤10000	2	5.13	收入来源(多选)	务农	30	76.92
	10001~50000	10	25.64		旅游相关服务业	16	41.03
	50001~100000	12	30.77		其他(外出打工、单位上班)	7	17.95
	>100000	13	33.33	参与旅游年收入	平均收入(元)	95444	
	不清楚或未填	2	5.13				

最后,抽样问卷调查主要是对案例地乡村文化胁迫维度、空间与机理进行调查。调查问卷一共包括四部分。一是调查对象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等。二是对家乡的旅游开发对本地文化影响的感受,主要用于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维度划分。三是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产生的影响因素,问卷第二、第三部分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法来询问被调查居民是否同意各题项的看法。第四部分是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空间特征调查题项,该部分是在所调查居民填完前三部分问卷后,引导其继续填写第四部分,让其对所列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载体受旅游开发胁迫的代表性程度打分(1表示“非常没代表性”、2表示“没有代表性”、3表示“一般”、4表示“有代表性”、5表示“非常有代表性”),并结合地图,标出所在村落中乡村文化载体受胁的大概位置(要求每个调查样本至少标出5~10个),本部分问卷共获得200份(陆巷100份、翁巷50份、杨湾50份)。

2.3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通过质性研究发现案例地的乡村文化胁迫类型和维度,第二部分主要是通过空间计量研究案例地的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格局。两部分方法具体阐释如下:

2.3.1 质性研究之扎根理论 质性研究的目的是发现案例地的乡村文化胁迫类型与载体、维度与命名。鉴于目前国内外尚无成熟理论为解释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效应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本研究运用社会学界和管理学界广泛采用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进行案例地乡村文化胁迫研究,该方法被认为是定性研究领域中最科学、最适合进行理论建构的研究方法之一。社会学研究一直因无法被重复和检验而被学界所诟病,“扎根理论”以规范且严格的研究过程为理论框架,成为在一定程度上可被重复检验的理论研究方法,使其自身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科学性^[26]。

“扎根理论”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家Glaser和Strauss关于死亡问题的合作研究中,并奠定了经典扎根理论学派的基础。随后,Strauss和Corbin、Charmaz相继对扎根理论进行了发展,分别形成了程序化扎根理论学派和建构型扎根理论学派,发展至今,扎根理论也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上述三大学派^[27,28]。鉴于经典扎根理论更具开放性且能发现更加丰富的理论形态,并且更加适用于对微观的、以行动为导向的社会互动过程的研究,本文遵循其研究程序和方法,对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编码和理论生成。经典扎根理论主要包括数据收集、数据处理(包括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和理论建构3个阶段^[26-28]。本研究首先对搜集到的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访谈原始数据进行初始编码,之后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将类属与亚类属进行关联,具体化类属的属性和维度。通过对数据进行客观分析,筛选出最能体现案例地乡村文化胁迫类型与载体的类属,进而进行理论抽样、饱和,并回到初始数据中,以再次访谈等方式填补数据缝隙,进一步发展已生成的理论。

2.3.2 定量研究之空间分析 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有随机型、均匀型和集聚型三种,虽然可以从地图上直观地看出点状地理要素的大体分布状况,但并不能把握其空间分布类型。而最邻近距离指数(Nearest Neighbor Indicator, NNI)恰好是一种定量描述空间点状要素分布形态的有效空间计量方法,所以本研究选取NNI来判断映射乡村文化胁迫空间载体资源点的基本分布类型。公式^{[29]76-77}如下:

$$NNI = \frac{\sum_{i=1}^n \min(d_{ij})}{n} / d(ran) \quad (1)$$

式中: n 为样本点数量; d_{ij} 为第 i 点到第 j 点的距离; $\min(d_{ij})$ 为 i 到最临近点的距离; $d(ran)$ 为期望平均最近邻距离,其取值一般为 $d(ran) = 0.5\sqrt{A/n}$; A 为研究区域面积; $NNI=1$ 表

式样本点随机分布, $NNI < 1$ 表示样本点呈集聚分布, $NNI > 1$ 表示样本点呈均匀离散分布。

在考察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空间分布特征和类型的基础上, 进一步运用核密度估计法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KDE) 进行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空间的集聚分析, 该方法可以得到研究对象点空间连续的密度变化图, 充分发现并直观地表达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扩散的距离衰减规律和空间集散特征。公式^{[30][37-38]}如下:

$$\hat{f}(x) = \frac{1}{nh^2\pi} \sum_{i=1}^n \left[1 - \frac{(x-x_i)^2 + (y-y_i)^2}{h^2} \right]^2 \quad (2)$$

式中: h 为阈值; n 为阈值范围内的点数; $(x-x_i)^2 + (y-y_i)^2$ 测度了点 (x_i, y_i) 和 (x, y) 之间的坐标偏离。本研究利用该方法在空间上清晰表达乡村文化载体资源点受胁程度的空间密度变化, 以判断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是面状集聚、轴状扩展、点状分布, 还是多中心分级分布。

3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类型

3.1 乡村文化胁迫类型与载体

为了从不同的切入点考察文化, 学者们多将文化进行分层论析, 乡村文化的构成可以从表层、中层和核心层来理解, 这三层文化又被学者们分别表述为物质、行为与精神文化^[31,32]。考虑到乡村文化当前尚无成熟的分类标准可以遵循, 本文参考郭凌等的研究成果^[31], 结合东山镇的相关史料、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实际情况, 通过对东山镇3个乡村旅游地39位居民访谈的录音文本进行逐人逐句的初始编码(表2), 获取录音数据片段以紧密贴合并真实有效反映行动, 达到“契合”和“相关”两个标准。通过对访谈录音资料片段化处理, 赋予相应概念, 并进行重新组合。在获得乡村文化3个核心范畴“乡村物质文化”“乡村行为文化”和“乡村精神文化”的基础上, 从访谈材料中提取案例地乡村文化26个概念及6个范畴。其中6个范畴分别为自然景观文化、聚落景观文化、生产生活文化、人际交往文化、节日仪式文化、人物精神文化(图2), 即乡村文化胁迫的六种类型。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映射的空间, 发源于乡村地域的乡村文化也不例外。参考已有研究, 本文认为无论是乡村物质文化, 还是乡村行为文化, 甚或乡村精神文化, 都有其映射的由点、线、面要素构成的空间载体^[33,34], 并通过该空间载体直观或间接反映文化胁迫

表2 案例地乡村文化胁迫类型及其载体访谈录音文本数据示例

Tab. 2 Examples of interview recording text data of rural cultural stress types and their carriers

访谈录音片段	编码
DS-01: 现在河里的水质真的很差, 农家乐开多了就会产生很多污水, 洗洁精那种化工的东西都留在河里了。以前小的时候, 我们的井水都可以喝的, 现在井水不能喝啦, 整个太湖的污染都很重。还有就是整个村子的格局都已经变掉了, 从我小学的时候开始变化的。	河; 农家乐; 井水; 太湖; 村落格局
DS-14: 这个路(紫石街)不好, 十个人十个都说这个路不行, 农民出去不方便, 车子开起来太颠簸了, 用车子把农副产物像杨梅、枇杷运出去全颠坏了, 现在都是农民肩挑着山上采下来的杨梅和琵琶挑出去, 原来的路都是铺砖路, 都是我们自己铺出来的, 现在这个路是不行的。	紫石街; 杨梅; 枇杷
DS-03: 我们这里游客多了以后, 比如说你发了财, 邻居他们就会眼红, 有竞争关系了, 大家都在做农家乐、开餐馆这些生意, 就是旅游带来的。	农家乐; 餐馆; 邻里关系
DS-05: 家庭和邻里关系以前也没有太好, 然后旅游发展之后变得更不好。他们的思想就停留在那里, 人的格局不一样, 邻里关系就发生了变化, 家庭关系也好不到哪去, 你看这边干活的都是老人, 年轻人是不干活的, 到我们80后这一代可能还会干一干, 炒茶和采枇杷, 我觉得以后也是没有人做了。	家庭关系; 邻里关系; 炒茶; 采枇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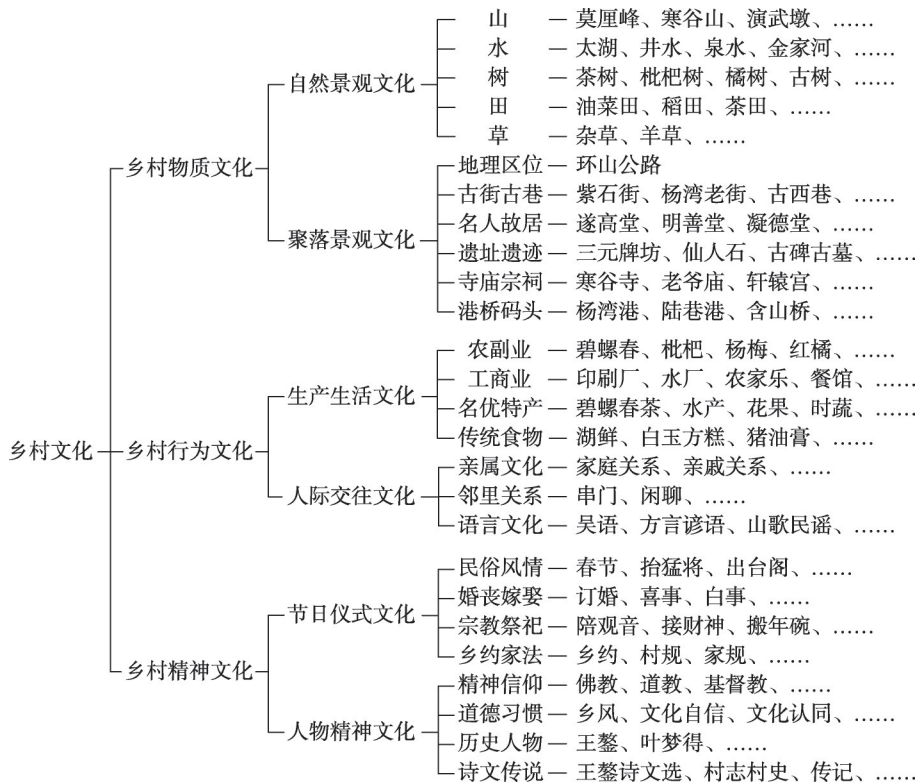


图2 发现乡村文化胁迫类型及载体范畴的选择性编码思维导图

Fig. 2 The selective coding mind map of discovering the categories of rural cultural stress types and their carriers

的特征。点状乡村文化资源的空间位置相对较好获取和表达，如名人故居、遗址遗迹、寺庙宗祠、港桥码头等，对于街道、河流、山地、湖泊等线状和面状的乡村文化资源，本研究结合这些面状或线状资源周边的资源单体，将其抽象化为1个点空间，进行后续的文化空间格局与演化研究，并在分类讨论的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予以说明。对于乡村行为、精神文化，则根据史料梳理的大事记和访谈对象的回忆、表述等内容，标出合理对应空间位置，予以客观反映。

3.2 乡村文化胁迫维度与命名

从访谈获取的26个概念及6个范畴出发，设计居民对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感知题项，进行问卷发放、收集和统计。首先，对回收问卷的所有题项样本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删除因子载荷小于0.40或多个因子载荷值大于0.4的题项，得到包含23个题项的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感知居民量表（表3）。其次，对所余题项样本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得到Cronbach's α 为0.854，大于0.80，表明数据信度可靠。KMO度量值为0.875，Bartlett's球形度检验值为4603.333 ($df=253, P<0.01$)，拒绝球形检验零假设，说明存在显著差异，通过效度检验，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再次，以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5个公因子，累计解释方差59.285%。最后，结合扎根研究，对提取的5个公因子进行命名，即“自然景观文化胁迫”“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生产生活文化胁迫”“人际交往文化胁迫”“精神仪式文化胁迫”，最后一个维度解释了原量表中节日仪式文化胁迫和人物精神文化胁迫的几乎所有题项，为了不产生较大出入和冲突，将其命名为“精神仪式文化胁迫”。后续研究中，以这5个乡村文化胁迫维度为基础进行空间格局分析。

表3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居民感知因子分析旋转成分矩阵

Tab. 3 Results of factor analysis on residents' perception on cultural stress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题项	自然景观 文化胁迫	聚落景观 文化胁迫	生产生活 文化胁迫	人际交往 文化胁迫	精神仪式 文化胁迫
破坏了山地的生态环境 (Z1)	0.624				
加重了河井湖泊的环境污染 (Z2)	0.776				
游客采摘花果破坏了果树林木 (Z3)	0.759				
使当地噪音增多了 (Z6)	0.425				
带来大量垃圾并使村落卫生环境变差 (Z7)	0.541				
导致村落的地理区位优势下降 (J1)		0.513			
加速了村落格局的破坏 (J2)		0.781			
损坏了村落的古街古巷 (J3)		0.794			
挤压了村中居民休闲的公共空间 (S2)			0.699		
导致了交通拥堵和出行不便 (S3)			0.639		
侵犯了个人隐私并扰乱了居民的正常生活 (S4)			0.565		
提高了农副产品和生活用品的价格 (S5)			0.661		
导致家庭和亲戚关系冷淡和疏离 (R1)				0.653	
导致邻里之间交流变少且关系逐渐淡漠 (R2)				0.819	
加速了方言、谚语、民谣等的流失 (R4)				0.488	
导致地方民俗风情等节庆活动的商业化 (Y1)					0.733
促使地方婚丧嫁娶等传统文化发生变异 (Y2)					0.845
促使宗教祭祀活动氛围下降或低俗化 (Y3)					0.857
导致乡约家法等规制的忽视遗忘或形同虚设 (Y4)					0.825
伤害或异化了本地居民的精神信仰 (W1)					0.767
居民道德素质和乡村风气下降 (如W2)					0.689
降低或沦丧了居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W3)					0.770
淡化或忘却了家乡的历史人物和诗文传说 (W4)					0.752
特征值	2.401	1.668	2.353	1.577	5.636
解释变量 (%)	10.439	7.251	10.232	6.858	24.504
累计解释变量 (%)	10.439	17.690	27.922	34.780	59.285

注：旋转法采用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在 7 次迭代后收敛。

4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格局

4.1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分布

根据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 (PPGIS) 中的参与式制图法 (PM), 将调查居民样本对乡村文化受旅游开发胁迫的代表性程度打分均值 (即胁迫水平, 用 H 代表) 赋值于其标出的本村落中的乡村文化载体资源点或大概位置, 并运用 ArcGIS 10.2 对其所感知到的乡村文化胁迫均值的空间分布进行分级可视化 (分级方法采用 Jenks 自然断裂法), 以发现案例地乡村文化及各维度文化胁迫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 3)。

总体乡村文化胁迫在空间上呈沿街、邻水分布格局, 其中处于旅游发展阶段的陆巷沿水分布最为明显, 分别处于旅游参与和探索阶段的翁巷和杨湾沿街分布更具代表性。根据图 3, 乡村文化胁迫主要呈沿村落内主要街道和河湖水系分布的空间格局, 水质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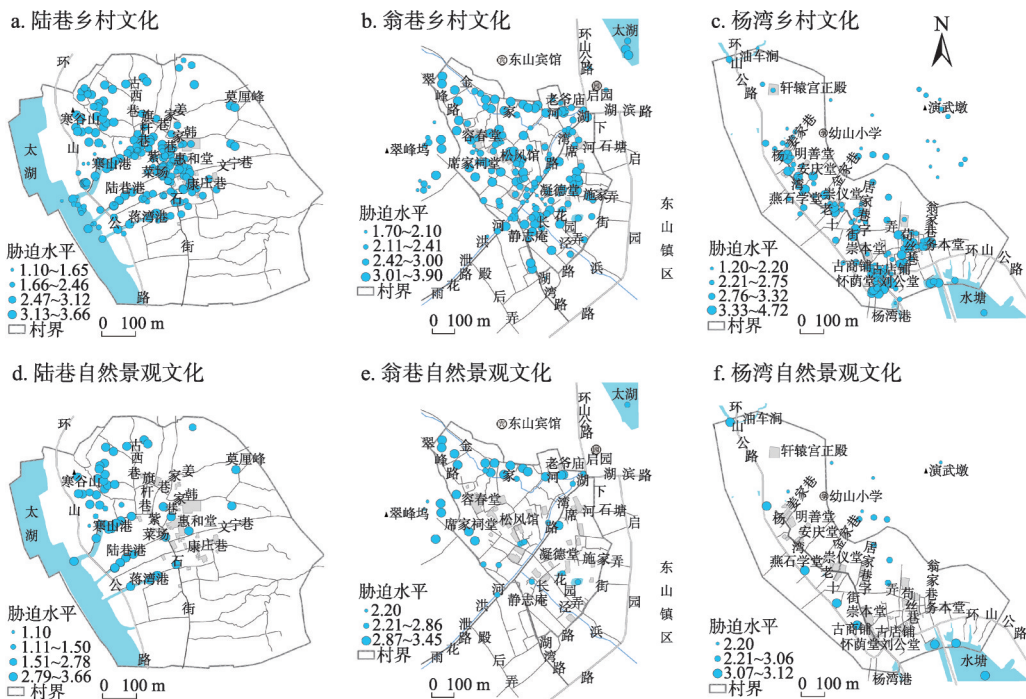


图3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分布

Fig. 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culture stress

差和交通拥堵成为居民日常关注的焦点，正如旅游地理学者章锦河所关注的，乡村生态是“巢”，乡村旅游是“风”^[5]，乡村旅游作为会下金蛋的“风”，在带来乡村经济振兴的同时，在案例地并没有很好地避免弄脏自己的“巢”的情况发生。具体来看，处于旅游发展阶段的陆巷乡村文化载体资源点的胁迫水平在1.10~3.66之间，陆巷居民提到的最具代表性的乡村文化受胁对象主要有太湖（H=3.66）、井水（玉带泉）（H=3.66）、寒谷渡（H=3.66）等水资源；处于旅游参与阶段的翁巷乡村文化胁迫水平在1.70~3.90之间，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湖湾路（村内主要街道）的交通拥堵（H=3.90）问题，其次是施家弄（H=3.90）等古巷的开发性破坏问题，翁巷紧邻东山镇区，游客如织却并不停留消费，受东山旅游开发的负面溢出效应最为典型；处于旅游探索阶段的杨湾乡村文化胁迫水平在1.20~4.72之间，当地居民普遍认为受旅游影响最为严重的是村内主要街道莫厘峰环路（H=4.72），外围环山公路的开通导致村落区位优势下降，致使以自产自销为经营方式的果农收入下降。总体来看，道路交通问题是处于旅游发展初期的乡村最易产生的胁迫症状，随着旅游的发展，水环境污染等与当地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逐渐凸显。

各维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分布特征不同。自然景观文化胁迫在空间上呈邻水、依山分布，村中果园用地也是自然景观文化胁迫的主要区域，旅游开发程度的提升使该类胁迫空间上趋于集中（限于篇幅，只汇报5个维度中的自然景观文化胁迫空间分布图作为代表）。例如，陆巷的自然景观文化胁迫水平在1.10~3.66之间，其中水环境胁迫较重（H=3.66），且主要分布于寒山港、古井（如玉带泉）和村口的太湖边上（图3d）；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空间上沿街分布特征明显，且与名人故居、遗址遗迹等历史建筑的空间位置具有高度叠合性，杨湾此类文化胁迫空间上最为集中，H值在2.13~4.72之间，且主要分布在杨湾老街及其沿线和村落南侧街巷。旅游开发之于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的产生并没有直

接的关系,但却起到了激化其受损的作用(如农家乐和新建房屋的增多),这在旅游发展阶段较高的陆巷表现最为突出,陆巷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旅游者进入,目前已有农家乐100多家,近年来村内出现了集中式翻修房屋,开办农家乐、旅游餐馆和民宿的热潮;生产生活文化胁迫主要沿主街分布,其中杨湾的胁迫水平和空间集中程度最高,旅游开发主要以交通拥堵和物价提升等途径带来乡村生产生活文化的变质,但各村居民对物价上涨的感知差异不大;人际交往文化胁迫空间相对分散,与旅游开发的核心受益区高度耦合,旅游开发程度越高,该类胁迫空间集中趋势越明显。例如,陆巷的人际交往文化胁迫水平相对较高,且主要位于村内旅游核心受益区(紫石街及重要景观节点附近),由于旅游受益并不均衡,这一区域成为家庭和邻里矛盾多发的重点区。究其原因,旅游开发导致基于金钱的价值观替代原先传统村落中基于道德的价值观,给村落带来了严重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精神仪式文化胁迫空间上较为分散,主要与节庆仪式路线(如抬猛将路线)和重要纪念性场地(如陆巷寒谷寺、翁巷静志庵、杨湾刘公堂等)在空间上具有高度重叠性。例如,翁巷居民提到最多的就是抬猛将会及其线路(如席家湖阿六猛将大年初三出会路线:白皮松—三号桥———倪家弄—猛将堂),但居民普遍反映旅游开发暂时还未导致以上民俗风情等节庆活动商业化,更没有导致本地婚丧嫁娶($H=1.70$)等传统文化异化,处于旅游探索阶段的杨湾村精神仪式文化胁迫水平最低。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总体上呈显著集聚,其中杨湾的态势最严峻,翁巷最弱,集聚程度与乡村文化资源点在各村落的位置和受胁水平高度相关,与所处旅游发展阶段关系不大。在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分布研究的基础上,运用NNI对旅游地乡村文化胁迫载体资源点进行平均最近邻距离分析,判断其空间分布类型(表4)。研究发现,无论旅游开发程度如何,3个乡村旅游地的文化胁迫空间在全局层面均表现出显著集聚,其中杨湾乡村文化胁迫的空间集聚程度最大、翁巷最小。根据表4,观测到的陆巷乡村文化胁迫的NNI为 $0.70 < 1$,Z得分为 -8.06 ,空间分布类型为显著集聚;翁巷的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程度最小,乡村文化载体资源点受旅游开发胁迫的NNI值为 0.85 ,并通过了 0.0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空间分布类型同样为显著集聚;杨湾的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程度最大,乡村文化胁迫的空间态势也最为严峻,其NNI值为 0.68 ,空间分布类型同样为显著集聚。

乡村文化胁迫各维度空间集聚特征差异明显,其中生产生活文化最易受到旅游开发胁迫而表现出空间受胁症状,且空间集聚程度在翁巷最高。3个乡村旅游地的自然景观、聚落景观、生产生活、人际交往和精神仪式文化胁迫空间的NNI值及其显著性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生产生活文化胁迫空间在各乡村旅游地均表现出显著集聚,说明其最易受到旅游开发的负面影响而在特定空间集中爆发。具体来看,陆巷和翁巷的自然景观、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的空间集聚均未通过 0.0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空间上虽呈集聚分布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表4)。杨湾的自然景观文化呈离散分布但同样不显著,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的NNI值为 0.49 ,空间分布类型为显著集聚;翁巷、杨湾和陆巷的生产生活文化胁迫的NNI值从小到大分别为 0.61 、 0.68 和 0.80 ,且均通过了 0.0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无论旅游开发程度如何,乡村的生产生活文化均会受到影响并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态势;陆巷、杨湾和翁巷的人际交往文化胁迫空间的NNI值从大到小分别为 1.28 、 1.13 和 0.92 ,前者空间分布类型为显著离散,后两者的空间分布类型均不显著;陆巷、翁巷和杨湾的精神仪式文化胁迫空间的NNI值分别为 0.62 、 0.92 和 2.93 ,其中杨湾为显著离散分布,翁巷为集聚分布,但不显著。

4.2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

为了判断与把握案例地总体及各维度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的特征及规律,以调研

表4 乡村文化胁迫的空间集聚性分析

Tab. 4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alysis of rural culture stress

案例地	类目	平均最近邻距离(m)	期望平均最近邻距(m)	NNI	Z得分	P值	空间分布类型
陆巷	乡村文化	12.07	17.18	0.70	-8.06	0.00	显著集聚
	自然景观文化	29.65	27.37	0.92	-1.08	0.28	不显著
	聚落景观文化	29.48	29.06	0.99	-0.19	0.85	不显著
	生产生活文化	35.45	27.70	0.80	-2.46	0.01	显著集聚
	人际交往文化	19.61	25.00	1.28	0.01	0.01	显著离散
	精神仪式文化	18.26	29.32	0.62	-4.15	0.00	显著集聚
翁巷	乡村文化	29.37	34.64	0.85	-3.81	0.00	显著集聚
	自然景观文化	56.60	64.54	0.88	-1.49	0.14	不显著
	聚落景观文化	38.41	40.43	0.95	-0.79	0.43	不显著
	生产生活文化	43.69	71.23	0.61	-4.25	0.00	显著集聚
	人际交往文化	53.43	58.17	0.92	-0.52	0.60	不显著
	精神仪式文化	58.41	63.43	0.92	-0.64	0.52	不显著
杨湾	乡村文化	28.58	42.00	0.68	-7.43	0.00	显著集聚
	自然景观文化	111.32	102.23	1.09	0.82	0.41	不显著
	聚落景观文化	25.33	51.31	0.49	-8.44	0.00	显著集聚
	生产生活文化	40.23	58.93	0.68	-3.38	0.00	显著集聚
	人际交往文化	69.72	61.55	1.13	0.84	0.40	不显著
	精神仪式文化	96.74	33.06	2.93	9.75	0.00	显著离散

居民样本对乡村文化载体资源点受旅游开发胁迫的打分均值为权重，运用核密度分析对乡村文化胁迫进行探析，并对结果进行分级可视化（图4）。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总体上呈多集核分级分布特征，具有中心集聚与外围分散并存的典型核心-外围分布模式，随着旅游发展阶段提高，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的核密度值显著提升。由图4，陆巷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具有“三心多点”多集核片状分布特征，其中以紫石街、三元牌坊和菜场所在区域、惠和堂以及古村入口处为中心，形成了一级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区，其边缘地区主要受到中心集核的扩散效应，呈由中心向外围逐级扩张的趋势变化特征；翁巷的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具有“多心多点”的多集核线状分布特征，分别在湖湾路沿线、松风馆、修德堂、施家弄、老爷庙等附近街巷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一级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区，并呈现出线状分布特征，这与翁巷居民所反映的交通拥堵问题不谋而合。杨湾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形成了“一心多点”分级线状分布的空间特征，其中在古店铺、怀荫堂至刘公堂区域形成了一级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区，在明善堂、务本堂等处形成了二级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区，其他区域如崇仪堂、苟丝巷、居家巷、十字弄、演武墩则属于三级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区。总体来看，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乡村由于村落格局和形态差异，文化胁迫空间集聚分布特征不同，但整体上乡村所处旅游发展阶段越高，其文化胁迫的核密度值越大。

各维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分布特征差异较大。自然景观文化胁迫空间呈“小集聚、大分散”的分布特征，带状和点状空间分布特征明显，其空间集聚密度同样和旅游发展阶段高度相关（只汇报5个维度中的自然景观文化胁迫空间集聚图作为代表）。由于自然景观文化载体资源点的对象主要是山、水、林、田、湖、草等，而它们的空间分布并不集中，呈带状和点状散落于整个研究区域，所以造就了此类胁迫空间带状和点状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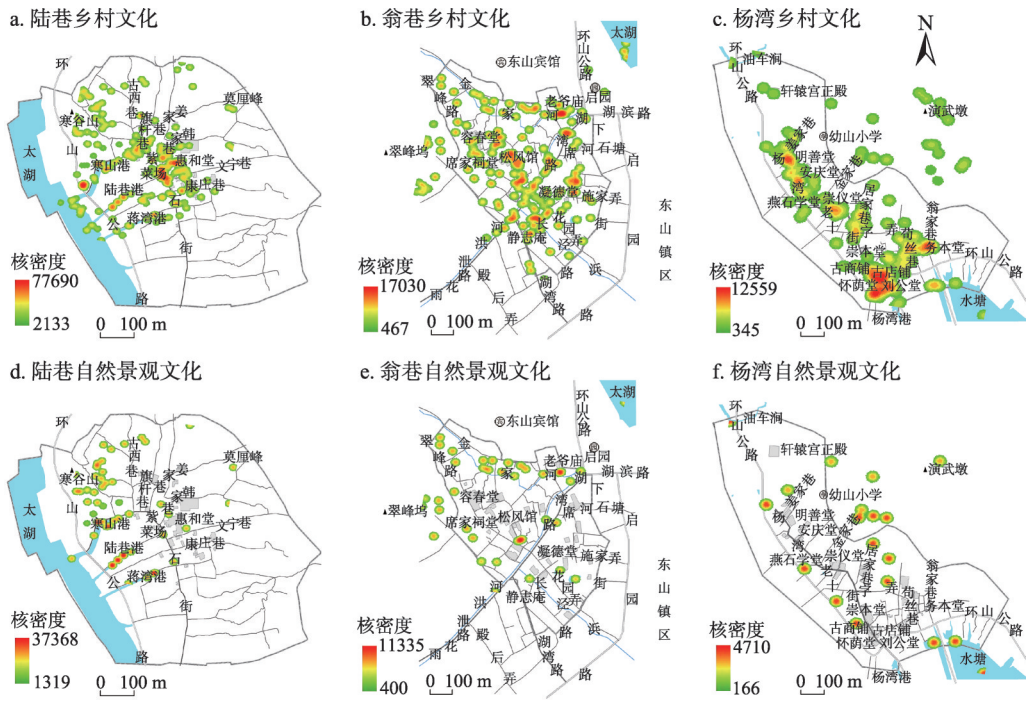


图4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
 Fig. 4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rural culture stress

布的特点，如处于旅游发展阶段的陆巷自然景观文化胁迫空间主要集聚于寒谷山及陆巷港、寒山港和蒋湾港的水系沿线，翁巷、杨湾的也主要集聚于村域水系和果林用地处；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空间呈“大聚集、小分散”的分布特征，分布模式无论是从空间形态上，还是从空间扩展趋势上都与总体特征最为相似。究其原因，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空间由于载体资源点数量较多，其分布模式与总体特征极为相似，这种相似主要表现在一级、二级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空间集聚区方面；生产生活文化胁迫空间呈“小聚集、小分散”的分布特征，沿主要街道呈带状分布的特征最为明显。其中，处于旅游发展阶段的陆巷文化胁迫空间集聚密度值最高，且主要在菜场、紫石街和文宁巷形成了一级生产生活文化胁迫空间集聚区，翁巷主要是在湖湾路和村北侧的小商店处，杨湾主要是在刘公堂对面的莫厘峰环路上，而次一级的集聚区在3个村落中分布相对离散；人际交往文化胁迫空间呈散点状分布，且旅游开发程度越高，点的离散程度越大，当地居民在谈到人际交往文化时，多想到的是自己家、邻居和学校等地，其中陆巷的人际交往文化胁迫空间集聚区散点状分布最为明显，翁巷次之，杨湾最不显著；精神仪式文化胁迫空间在各案例地的分布规律差异较大，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提升，其分布由离散逐渐趋于集聚，处于不同乡村旅游发展阶段的案例地该类空间分布差异较大。

5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机理

5.1 乡村文化胁迫因素选取

根据已有研究，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产生和发展与当地居民的个人社会属性因素（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是否参与旅游业等）紧密相关，如Mason认为

女性更关注旅游开发的消极效应^[35]，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对旅游的文化积极和消极影响感知越强烈^[36]，受访者对文化影响的感知情况与他们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也有关^[37]。此外，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和当地居民的观念认知因素（如居民地方文化认同^[38]、地方依恋程度^[39]、旅游参与水平^[40]、主客文化差异水平^[41]等）也密不可分，还和乡村旅游地自身的基础条件因素有关，如区位交通^[17]、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42]等。Harrill认为社会发展因素同样是影响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重要因素^[43]，主要包括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和接待规模^[44]、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乡村外来人口数量和本地人口密度^[45]等。最后，当地旅游经营与管理部的政策宣传因素也最有可能影响乡村文化胁迫，如乡村旅游管理体制和旅游资源产权归属^[46]、新闻媒体宣传引导等^[47]。总体上，当地居民个人属性和观念认知的差异有可能造成其对旅游开发胁迫感知的不同，进而采取相异的社会实践，影响乡村文化的胁迫变迁。而乡村自身的基础条件、社会发展和政策宣传，则可能通过内、外环境的改变，影响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根据乡村文化胁迫因素归属的不同，本文将其划分为个体和整体两个层面进行乡村文化机理的阐释，其中个体层主要包括个人属性和观念认知因素；整体层主要包括政策宣传、基础条件和社会发展类因素。

5.2 乡村文化胁迫机理分析

乡村文化是个体在乡村地域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自古有之，但现代社会的乡村文化弱化已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是演化成了影响社会发展的普遍问题。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机理，在个体层面可以从个体的社会属性及其观念认知进行阐释（图5）。① 社会属性方面：胁迫效应的感知水平和差异与个体的人口统计特征相关，知识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越低，感知到的胁迫越低，地方文化的自觉意识就越低^[47-49]。此外，随着年龄增长以及本地居住年限的延长，还有家庭收入高低和是否参加旅游等也会对文化胁迫感知产生影响。按照社会交换理论，参与旅游年收入水平越高，居民对旅游的依赖度越大，旅游的文化消极影响感知就越弱^[49]。② 观念认知方面：按照计划行为理论，乡村文化胁迫演化与个体的观念认知密切相关，这一过程是“人”的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态度对“地”实践的结果。作为“人”的精神逻辑通过行为逻辑对“地”进行实践而作用于社会和物质空间后的结果，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更多是从内生层面受到此类要素影响而产生特定分布格局^[17]。往往个体对地方的认同越低，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越大^[4]。居民与游客之间的文化差异和接触程度越高，乡村文化越容易受到旅游影响而产生胁迫效应^[47]。旅游导向的乡村存在收入分层、社会不公现象，导致村落社会凝聚力降低。旅游推动着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旅游的市场经济规范对传统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旅游者无意识中传达的价值观影响着乡村地区质朴的文化观念。旅游发展加速了乡村物质文化的变迁、行为文化的变异和精神文化的同质化^[4,46]。

整体层面，从政策宣传、基础条件和社会发展三方面探究文化胁迫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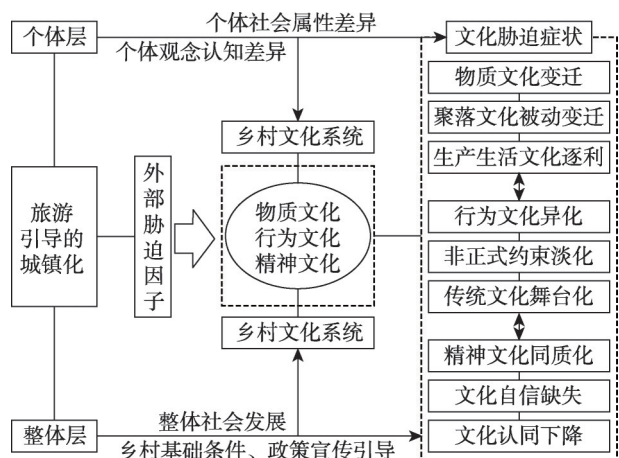


图5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机理

Fig. 5 The cultural stress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理。① 政策宣传方面：乡村旅游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及旅游资源产权归属不明等问题是造成地方矛盾、降低乡村氛围和乡村性的源泉^[5,46]。国家和地方政府虽然制定了一系列的地方文化保护政策，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不免出现各种问题，监督、考核及评价体系的不完善甚至缺失严重影响着乡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此外，建设中破坏和新闻媒体的误导等同样是造成乡村文化胁迫的主要原因；② 基础条件方面：旅游开发作用于不同基础条件的乡村所带来的文化胁迫程度和症状不同，在区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旅游要素推进的过程中，乡村景观被动更新，造成乡村原有格局和原真性景观不断消失或异化^[2,50]。此外，可进入性强的乡村，游客更容易进入而抬高当地物价甚至造成交通拥堵，对当地文化带来冲击，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面临着自身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多重基础要素的缺失或压力，在胁迫过程中传承了千年的乡村文化逐渐发生变质^[5,51]。③ 社会发展方面：旅游接待水平的提高，在外来游客的渗透和挤压下，乡村社会的交往空间日益萎缩，旅游者正逐渐侵占并解构着乡村的生产和生活空间。本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在适应旅游的发展过程中调整、简化，生产生活节奏加快，地方传统行为文化日益淡化，乡村甚至失去了过去的宁静祥和与淳朴安逸^[52,53]。外来人口的增加与本地居民的外流是乡村文化嬗变的外在表征，当前的乡村文化面临着文化载体老旧化、文化主体空心化、文化功能退异化、文化传承艰难化等一系列问题。

总的来看，在城镇化进程中，个体的价值观念受到现代性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地方的物质景观呈现以旅游者为核心的被动改变^[3,51]。乡村文化中传统的价值观遭受着现代基于金钱的价值观的侵蚀，外来游客裹挟的消费理念渗入乡村居民的生活中，侵蚀着他们的文化认同与自信，很大可能会破坏当地传统文化的原生环境，致使乡村文化的传承断裂^[5]。乡村文化胁迫过程中，个体和整体层因素共同作用着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产生和发展，个体在乡村传统文化变异与弱化过程中通过无意识的感知、行为和实践对乡村文化胁迫产生影响，带来文化胁迫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内生性演化，而整体则通过内、外驱动乡村旅游地文化的胁迫变迁，在一定的时间横截面上呈现出特定的空间胁迫格局和结构。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快速城镇化和旅游开发背景下，乡村文化衰落已成客观事实。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和文旅融合发展的诉求要求我们必须理清旅游开发和乡村文化的关系，把握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类型和空间规律，并揭示乡村文化胁迫机理。本文以苏州东山镇陆巷、翁巷和杨湾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质性研究和空间计量等方法，探索了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类型与维度，分析了乡村文化胁迫的空间格局和机理，得出如下结论：

(1) 开发了包含23个题项的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感知居民量表，并通过了量表的效度和信度检验。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可以划分为“自然景观文化胁迫”“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生产生活文化胁迫”“人际交往文化胁迫”“精神仪式文化胁迫”5个维度，且每个维度都有具体的映射空间载体与其相对应。

(2)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在东山镇多呈沿街、邻水分布，交通拥堵是处于旅游发展初期的乡村最易产生的胁迫症状，随着旅游发展阶段提升，水质、物价等密切关乎当地居民生活的胁迫问题逐渐凸显。各维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分布特征差异较大，其中自然景观文化胁迫空间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提升趋于集中，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空间与历史建筑

的具体位置存在高度耦合,旅游发展阶段越高,激化聚落景观文化受胁的可能性越大。生产生活文化胁迫多沿主街分布,而人际交往文化胁迫空间与村内旅游核心受益区高度重叠,所处旅游发展阶段越高,这一类空间越集中。精神仪式文化胁迫空间主要分散分布于节庆仪式路线和重要纪念性场地。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总体上呈显著集聚,集聚程度与所处旅游发展阶段关系不大,各维度空间分布类型差异明显,其中生产生活文化最易受到旅游开发胁迫而表现出空间受胁症状,并在翁巷空间受胁的集聚程度最高。

(3)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总体上呈多集核分级分布特征,具有核心-外围的空间分布模式,且随着旅游发展阶段的提高,其空间集聚的核密度值显著提升。各维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分布特征差异较大,其中自然景观文化胁迫空间具有带状和点状分布的“小集聚、大分散”特征,且主要位于山脚、河塘边的果林种植处,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空间具有“大集聚、小分散”特征且分布模式与总体特征最为类似。生产生活文化胁迫空间呈沿主街带状分布的“小集聚、小分散”特征,人际交往文化胁迫空间呈散点状分布,且两类胁迫空间的分布特征均在处于旅游发展阶段的陆巷最为明显。精神仪式文化胁迫空间随旅游发展阶段的提升,空间分布由离散趋于集聚。

(4)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个体和整体两个层面。个体层面,社会属性的差异和观念认知的不同,通过个体无意识的感知、行为和实践对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产生影响,带来乡村文化胁迫空间的内生性演化;整体层面,乡村基础条件、整体社会发展和政策宣传引导,通过内、外驱动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变迁的发生、发展,并在空间上呈现出特定的胁迫格局、结构和过程。

6.2 讨论

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在带来乡村经济振兴、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也导致乡村文化的人为破坏、日渐衰落甚至部分消失,出现文化商品化和文化同质化等系列问题^[1]。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中国乡村的地位推上了新的高度,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的振兴,文旅融合发展的主观诉求也要求我们必须把握好乡村旅游地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伴随着国际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思潮,把文化的空间研究转向空间的文化研究,将胁迫生态学理论引入到乡村旅游人地关系的研究中,从文化胁迫视角解析乡村文化的衰落现象,便成为当前乡村文化保护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下迫切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17]。本研究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对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类型、格局与机理进行初步探索,旨在为未来研究提供一种方向或启示,并为未来研究方向和领域的确定提供一定的借鉴,以吸引更多的学者去重视和关注乡村旅游地的文化传承和保护等重要议题。未来,根据乡村文化胁迫症状和乡村旅游地文化保护内涵与维度,提出乡村文化的旅游可持续利用模式与策略,才能为案例地及中国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的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参考,有效促进乡村旅游社区的稳定和繁荣。

致谢:感谢周叶鹏、于逢荷、荣慧芳、童健、马小宾、唐文敏、秦东丽、杨嘉慧等同学在苏州东山镇调研工作中的辛勤付出!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引言梳理、机理分析部分给出客观、详实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Lankford S V. 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 toward tourism and rural regi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4, 32(3): 35-43.
- [2] 卢松. 旅游对传统地域文化景观影响的研究进展及展望. *旅游科学*, 2014, 28(6): 13-23. [Lu Song. On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studies on the impacts of tourism on the cultural landscapes in traditional regions. *Tourism Science*, 2014,

- 28(6): 13-23.]
- [3] 黄震方, 黄睿. 城镇化与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研究: 学术争鸣与研究方向. 地理研究, 2018, 37(2): 233-249. [Huang Zhenfang, Huang Rui. Research progress on rural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cademic debate and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2): 233-249.]
- [4] 孙九霞, 吴美玲. 商品化视角下族群内部主体的文化认同研究: 以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纸为例.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37(3): 67-73. [Sun Jiuxia, Wu Meiling. Research on cultural identity of ethnic subjects withi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dity: Taking the Naxi Dongba paper in Lijiang, Yunnan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 37(3): 67-73.]
- [5] 黄震方, 陆林, 苏勤, 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 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 地理研究, 2015, 34(8): 1409-1421. [Huang Zhenfang, Lu Lin, Su Qin, et 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predicamen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8): 1409-1421.]
- [6] Lu L, Bao J, Huang J, et al.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s in tourism geography of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6, 26(8): 1197-1222.
- [7] 谢彦君. 呵护“姆庇之家”, 重塑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新理念. 旅游学刊, 2017, 32(1): 8-10. [Xie Yanjun. Care of "House of Muubi", remodeling the new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ourism Tribune*, 2017, 32(1): 8-10.]
- [8] 王建英, 邹利林, 黄远水, 等. 基于胁迫生态理论的旅游度假区用地布局优化: 以武夷山国家旅游度假区为例. 生态学杂志, 2017, 36(4): 1165-1172. [Wang Jianying, Zou Lilin, Huang Yuanshui, et al. Layout optimization of tourism resort lands based on stress ecology theory: A case study of Wuyishan national tourist resort. *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 2017, 36(4): 1165-1172.]
- [9] Steinberg C E W. *Stress Ecology: Environmental Stress as Ecological Driving Force and Key Player in Evolution*. Heidelberg London New York: Springer, Dordrecht, 2012.
- [10] 徐冬, 黄震方, 李东晔, 等. 胁迫视角下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研究进展与框架构建. 人文地理, 2019, 34(6): 17-25. [Xu Dong, Huang Zhenfang, Li Dongye, et al.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framework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mpacts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ess. *Human Geography*, 2019, 34(6): 17-25.]
- [11] Creel S, Dantzer B, Goymann W, et al. The ecology of stress: Effects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Functional Ecology*, 2013, 27(1): 66-80.
- [12] 李存芳, 董梅, 王青, 等. 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行为外溢效应与胁迫效应的研究进展. 经济地理, 2017, 37(3): 106-112. [Li Cunfang, Dong Mei, Wang Qing, et al. The research process on spillover effect and intimidation effect of interregional transfer activities of resources-exhausted enterprises.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3): 106-112.]
- [13] 邹仁爱, 陈俊鸿. 城市胁迫发展理论: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视角. 城市问题, 2005, (6): 18-22. [Zou Renai, Chen Junhong. Urban stress development theory: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f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rban Problems*, 2005, (6): 18-22.]
- [14] 方创琳, 周成虎, 顾朝林, 等. 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效应解析的理论框架及技术路径. 地理学报, 2016, 71(4): 531-550. [Fang Chuanglin, Zhou Chenghu, Gu Chaolin, et al.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interactive coupled effect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mega-urban agglomeration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4): 531-550.]
- [15] 保继刚, 张骁鸣. 1978年以来中国旅游地理学的检讨与反思. 地理学报, 2004, 59(S1): 132-138. [Bao Jigang, Zhang Xiaoming. Tourism geography in China (1978-2003): A review and retrospec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4, 59(S1): 132-138.]
- [16] 保继刚, 张捷, 徐红罡, 等. 中国旅游地理研究: 在他乡与故乡之间. 地理研究, 2017, 36(5): 803-823. [Bao Jigang, Zhang Jie, Xu Honggang, et al. Tourism geography in China: Between hometown and alien land.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5): 803-823.]
- [17] Rasoolimanesh S M, Ringle C M, Jaafar M, et al. Urban vs. rural destinations: Residents' perception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0: 147-158.
- [18] 李卫华, 赵振斌, 李艳花. 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综合感知及差异分析: 以陕西韩城党家村为例. 旅游科学, 2006, 20(6): 52-58. [Li Weihua, Zhao Zhenbin, Li Yanhua. An analysis of comprehensive perception and variations of residents in ancient village tourism areas: A case study of Dangjiacun in Hancheng, Shanxi. *Tourism Science*, 2006, 20(6): 52-58.]
- [19] Sharpley R. Host perceptions of tourism: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2(2): 37-49.
- [20] Andriotis K. Community groups' perceptions of and preferences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rete.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2005, 29(1): 67-90.

- [21] Nicholas L N, Thapa B, Ko Y J. Residents' perspectives of a world heritage site: The pitons management area, St. Lucia.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9, 36(3): 390-412.
- [22] 王纯阳, 屈海林. 村落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 *地理学报*, 2014, 69(2): 278-288. [Wang Chunyang, Qu Hailin. 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development of village heritage sit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2): 278-288.]
- [23] 孙九霞, 苏静. 旅游影响下传统社区空间变迁的理论探讨: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反思. *旅游学刊*, 2014, 29(5): 78-86. [Sun Jiuxia, Su Jing. Traditional community space chan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A reflective study based on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Tourism Tribune*, 2014, 29(5): 78-86.]
- [24] 沈炳荣. 东山镇志.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 [Shen Bingrong. *Historical Records of Dongshan Town*.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02.]
- [25] 杨维忠, 金本福, 薛利华. 东山历史文化丛书·东山艺术志. 扬州: 广陵书社, 2008. [Yang Weizhong, Jin Benfu, Xue Lihua. *History and Culture Series of Dongshan: Art and Literature Records of Dongshan*. Yangzhou: Guangling Press, 2008.]
- [26] 徐雅雯, 甘巧林. 扎根理论视角下旅游非正式部门成长路径: 以安徽西递古村为例. *人文地理*, 2016, 31(5): 99-105. [Xu Yawen, Gan Qiaolin. The Growth path of tourism informal sector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A case of Xidi ancient village in Anhui. *Human Geography*, 2016, 31(5): 99-105.]
- [27] Glaser B, Strauss A L.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67.
- [28] Charmaz K C.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2006.
- [29] 王劲峰, 廖一兰, 刘鑫. 空间数据分析教程.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76-77. [Wang Jinfeng, Liao Yilan, Liu Xin. *Spatial Data Analysis Tutorial*.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0: 76-77]
- [30] Wang F.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in GIS*. Abing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36-38.
- [31] 郭凌, 杨启智. 乡村旅游开发与乡村文化变迁.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 [Guo Ling, Yang Qizhi.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ural Cultural Changes*. Chengdu: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2014.]
- [32] 张艳, 张勇. 乡村文化与乡村旅游开发. *经济地理*, 2007, 27(3): 509-512. [Zhang Yan, Zhang Yong. Rural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27(3): 509-512.]
- [33] 吕龙, 黄震方, 陈晓艳. 文化记忆视角下乡村旅游地的文化研究进展及框架构建. *人文地理*, 2018, 33(2): 35-42. [Lv Long, Huang Zhenfang, Chen Xiaoyan. Progress in culture studies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and research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Human Geography*, 2018, 33(2): 35-42.]
- [34] 吕龙, 黄震方, 陈晓艳. 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类型、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地理研究*, 2018, 37(6): 1142-1158. [Lv Long, Huang Zhenfang, Chen Xiaoyan. Type classification,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space: A case study of Jinting town in Su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6): 1142-1158.]
- [35] Mason P, Cheyne J. Residents' attitudes to proposed tourism development.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 27(2): 391-411.
- [36] 章锦河. 古村落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分析: 以黟县西递为例.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3, 19(2): 105-109. [Zhang Jinhe. Research on ancient village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tourism impact: A Case of village Yixian-Xidi.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03, 19(2): 105-109.]
- [37] Teye V, Sirakaya E, Sönmez S F.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3): 668-688.
- [38] Kang S K, Lee J. Support of marijuana tourism in Colorado: A residents' perspective using social exchange theory.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8, 9: 310-319.
- [39] Jurowski C, Uysal M, Williams D 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host community resident reactions to tourism.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7, 36(2): 3-11.
- [40] O'Reilly A M. 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 Concepts and issues. *Tourism Management*, 1986, 7(4): 254-258.
- [41] 卢松, 张捷, 李东和, 等.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比较: 以西递景区与九寨沟景区为例. *地理学报*, 2008, 63(6): 646-656. [Lu Song, Zhang Jie, Li Donghe, et al. Comparison of resort 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Case studies in Xidi village and Jiuzhaig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63(6): 646-656.]
- [42] Brunt P, Courtney P. Host perceptions of sociocultural impact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 26(3): 493-515.

- [43] Harrill R, Potts T D. Tourism planning in historic districts: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arlest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3, 69(3): 233-244.
- [44] Wang S, Chen J S. The influence of place identity on perceived tourism impact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5, 52: 16-28.
- [45] 卢松, 张业臣, 王琳琳. 古村落旅游移民社会融合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世界文化遗产宏村为例. *人文地理*, 2017, 32(4): 138-145. [Lu Song, Zhang Yechen, Wang Linlin. Social integration structure and determinant of tourism migration in ancient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Hongcun villiage. *Human Geography*, 2017, 32(4): 138-145.]
- [46] Williams J, Lawson R. Community issues and resident opinions of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1, 28(2): 269-290.
- [47] 吴丽敏, 黄震方, 谈志娟, 等. 江南文化古镇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及其形成机理: 以同里为例. *人文地理*, 2015, 30(4): 143-148. [Wu Limin, Huang Zhenfang, Tan Zhijuan, et al. Tourism impact perception of residents in Jiangnan ancient town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A case study of Tongli. *Human Geography*, 2015, 30(4): 143-148.]
- [48] Akis S, Peristianis N, Warner J. Residents' attitudes to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Cyprus. *Tourism Management*, 1996, 17(7): 481-494.
- [49] Tosun C. Host perceptions of impacts: A comparative tourism stud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1): 231-253.
- [50] Gursoy D, Rutherford D G. Host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An improved structural model.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31(3): 495-516.
- [51] 龚伟. 基于空间视角的乡村旅游社区演化研究.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Gong Wei. *Research on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Evolution in Spatial Perspective: Taking Village Q and Village Y in The Suburbs of Shanghai as an Example*.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16.]
- [52] Rasoolimanesh S M, Roldán J L, Jaafar M, et al. Factors influencing residents' perceptions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across rural and urban World Heritage Sites.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7, 56 (6): 760-775.
- [53] 黄震方, 黄睿. 基于人地关系的旅游地理学理论透视与学术创新. *地理研究*, 2015, 34(1): 15-26. [Huang Zhenfang, Huang Rui.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academic innovation of tourism geography based on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1): 15-26.]

Types, spatial pattern and mechanism of cultural stress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A case study of Dongshan town in Suzhou

XU Dong¹, HUANG Zhenfang², HONG Xueting², LI Dongye², SHEN Weili²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urbanization, the culture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is increasingly impacted, and the decline of rural culture has become an indisputable fact.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taking Dongshan Town in Suzhou city as an example, we explored the types, spatial pattern and mechanism of cultural stres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by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spatial measurement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cale of cultural stress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constructed by the grounded theory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contains 23 items and 5 dimensions, namely natural landscape culture stress, settlement landscape culture stress, production and living culture stress, interpersonal culture stress and spiritual ritual culture stress. (2)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GIS spatial analysis, the rural cultural stress space is mostly distributed along the street and water. Traffic jams are the most common stress symptoms in rural areas at the early stag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e problem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ife of local residents, such as water pollution and price ris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Otherwis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al stress in each dimension are quite different. The general space of rural culture stress shows significant agglomeration, among which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culture is most vulnerable to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shows symptoms of spatial stress. (3) The rural culture stress space has the core-peripheral pattern with multi-core hierarchical distribution, and its spatial agglomeration degree will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among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al stress in each dimension. Among them, the settlement landscape cultural stress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large aggregation and small dispersion. (4) Factors affecting cultural stress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can be identified into the individual and whole levels. The differences in social attributes and conceptual cognition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s well as the basic condition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propaganda at the whole level, play a role i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tres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Keywords: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rural culture; spatial pattern; stress mechanism; Dongshan town